

学问越做越便宜？别拉互联网背锅

玉渊杂谭

陈莹

“从深阅读的角度，互联网这个东西很坏。”7月初的思南读书会上，又有学者向互联网“开炮”，认为互联网会对读书做学问产生“万劫不复”的影响：“以前的学者做研究，用一辈子时间，先编年谱，再注文献，一首一首考证清楚。现在占据的材料越来越多，但消化、融会贯通的功夫势必越来越少。”

这样说的初衷或许是给那些靠搜索引擎堆积材料、弄弄学问的“知道分子”提个醒，但一味提倡前人皓首穷经式的治学方法，却未免有厚古薄今之嫌了。

互联网给文化普及和学术研究带来的便利毋庸置疑。现在想读《论语》，随手一搜数十种版本立时出现，甚至包括难得一见的珍本善本。想想苏轼感慨古人求书之难，有幸得一部经典，都要亲手抄，日夜诵读。后来雕版印刷术渐渐普及，才有了市面争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的局面。

印刷术在宋代普遍应用，堪称一场由生产技术进步而带来的“媒介革命”。阅读的方式由手抄“传写”到纸质阅读，宋代人

没有迷失在“日传万纸”的“知识井喷”中，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的书籍反而拓宽了读书人的视野，激活了人们更多的兴趣点：哲学领域理学兴盛，科学领域沈括、李诫等人在历数、数理、建筑工艺方面均有发明；史学则有司马光、洪迈、袁枢……宋代学术思想之活跃，文化风光之蔚然，令后世学者惊叹，史学大师陈寅恪就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都会推动媒介发生重大进步。互联网对人们读书做学问的影响，说到底是我们该如何看待新一轮媒介革命——数字革命对文化边界的冲击

问题。获取知识的渠道丰富了，方式容易了，人们的眼界也宽了，研究问题的视角、思路和方法，也会朝着更多元、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想想最近古代文学学者将考证成果与大数据结合，搞出来的“诗人轨迹地图”引来多少关注和点赞，就更没必要担心互联网技术会使“学问变得越来越便宜”。面对“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海量数据，是能善加利用做出令人惊喜的真东西，还是靠堆砌材料做“注水成果”，说到底得看研究者个人的学养和经验，有没有下苦功钻研的职业精神。拿不出好成果，这个“锅”真不该让互联网来背。

字里行间

“匠人”这个词可谓“忽如一夜春风来”，颇有点“一夜复兴”的意思。现代人愁肠满怀，试图追忆失落的匠人精神，仿佛这浮躁的社会，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工作台。

理查德·桑内特的《匠人》是一本文化史和社会学著作，书中的聚焦点不在“匠人精神”，而是更为具体的“匠艺”。什么是“匠艺”？桑内特认为，它没那么复杂，只是一种持久的人性冲动——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欲望。当然，桑内特也承认，这确实是一种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而日渐消失的生活方式。

他花了大量篇幅讨论这些实践——陶艺、吹玻璃、看食谱和浇水泥。煞有介事，一本正经，不禁让人疑惑——他怎么啥都知道？于是查了一下资料，原来这位师从汉娜·阿伦特的社会学大师，自小学习小提琴，直到后来因手伤才放弃。桑内特在书中强调“手”和“脑”的协调，他自己在学小提琴的过程中大概感悟颇深。

是的，桑内特在书中试图为劳动者正名。桑内特的老师阿伦特区分了“劳动之兽”和“创造之人”。“劳动之兽”只管完成任务，将工作视为目的；“创造之人”则更高一等，是物质劳动和实践的判断者，他们是“劳动之兽”的上司。但桑内特并不赞成这种区分，哪有什么不过脑子的机械性劳动？所谓的“劳动之兽”，他们的手在触摸工艺材料，他们的脑子同样在思索如何完成和这材料的互动，“思维和情感是包含在制造的过程之中的”。

这是一个充斥着人造物的世界。如何在人造物的世界中“人性地栖息”？

书中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们可以过上一种更具人性的物质生活，前提是我们更好地理解物品的制造过程。

“匠人”一词的范畴广泛，按照桑内特的定义，钢琴师、厨师、建筑师甚至熟练掌握带娃技巧的父母，都能被纳入“匠人”麾下。专注过程、不计后果的匠人精神，其实也很难说得上到底是好是坏。毕竟，你也可能专注地造出了弗兰肯斯坦，专注地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但是，优秀的匠人进行思考，他们会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伦理问题不应等到造物完成后才由“创造之人”厘清，处在制造过程中的“劳动之兽”们，分明对生产过程有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他们是真正能对造物起作用的那批人，他们是真正能扭转局面的人——毕竟，当一切完成，再去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已经失去了意义。

关键前提是，你要了解，造物对你自己意味着什么。

人类害怕被自身发明的器物反噬，这仿佛植根于人类文化。看看当今对人工智能的讨论就可以一窥一二。AlphaGo大杀四方，于是人类就有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感；人工智能在综艺节目上谈笑风生，于是网络评论一片“心脏受不了”的哀嚎。

人类当然不希望人造物凌驾于自己之上。他们造了太多东西，又担心无法收场。最

匠艺不绝，省在自身

张盖伦

著名的例子是原子弹，连专家自己都不甚清楚这究竟是个什么。阿伦特希望创造之人的判断力能够阻止人类自我伤害，而学生桑内特则将重任交给了“劳动之兽”——如果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物品的制造过程，我们可以把东西造得不那么可怕。

匠人精神，落到最后，在我的理解中，成了某种对制造过程负责的态度。桑内特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匠人，因为匠人的工作节奏和儿童的游戏差不多，没什么高深。

综艺节目《奇葩说》里有道辩题——人类发现了高等生物的蛋，要守护还是要毁灭。守护，可能会以一出农夫和蛇的悲剧收场；而毁灭，又在违背人类的好奇天性。嘉宾A说，这道题的本质，是“玩不起的事情要不要玩”；嘉宾B说，不对，这道题其实在问的，是“好奇心和安全感”，你到底选什么。

人们总害怕自己会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这仿佛是诸神对人类命运的诅咒。但人类还是会偷食那颗禁果，又仿佛是生而为人的坚持。

创新的后果如何？不知道。但是，身处制造过程中的匠人自己，应该去理解、去思索、去讨论，并在一切无可挽回之前，发现问题，修正问题。

毕竟，你们可是承担着阻止人类自我伤害使命的匠人呀！

摄手作

数字幻梦

(本栏目图片均由手机拍摄)



本报记者 孙韵孜摄



本报记者 孙韵孜摄



付晓妍摄

一场悦纳技术的蝶变

随想录

崔爽

繁花铺天盖地，生长，绽放，凋落，你若伸手去碰触花瓣，它会萎谢，你若静立不动，它们会簇拥着你越开越盛。

你并非身处奇幻森林，这是近日火爆北京的跨界艺术团体 TeamLab 的作品《花舞森林与未来游乐园》。你所看到的花朵盛开与凋落，鸟儿飞翔与栖息，每一刻的变化都经过了感应器与程序的精密运算。游览这个由数字代码构建的幻境，需要携带的仅仅是一部智能手机——拿起手机自拍、记录，同时也成为这场沉浸式

术展的一部分。

随着网络原生代的崛起，科技与艺术不再是光谱的两端，捧着手机长大的“自拍一代”不再满足于旁观艺术，在由他们创造的体验式艺术中，观看和参与、技术和艺术的界限进一步模糊。像 TeamLab 这样的跨界艺术尝试还有很多。英国艺术机构 Random International 的作品《雨屋》中，无数监测观众动作的镜头和天花板上的感应器联动，当人走过就停止降雨，像给观众头上撑了一把无形的伞，使其雨中漫步却不淋湿。西班牙的 Lummo 工作室也曾经将“俄罗斯方块”投影在城市广场的巨型屏幕上，来往行人的走动会造成方块的移动和翻转，广场变成大型互动游乐场。

智能手机时代的来临拓宽了艺术的边界，人们创作艺术、体验艺术的方式都与数字科技有着密不可分且浑然天成的联系。一机在手，普通人能随时随地用最简单的方式拍下他们眼中的世界，以此表达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成为生活中的“艺术家”，当然也可能成为艺术的一部分。从 2007 年 iPhone 诞生起，iPhone 摄影大赛（简称 IP-PA）也应运而生。连续三年揽获 IPPA 六个奖项的台湾女孩章浩在评价这种“人手一机”的拍摄时说：“除了能比较精准地掌控和捕捉到自己期待的画面之外，它们也是我搜集素材的方式之一，利用后制或者拼贴的现代艺术风格能够创造出另一种不同于传统摄影的艺术。”

诚然，没有一项技术能够与它所服务的艺术门类始终比肩，它们之间既存在美妙的共生，也有残酷的博弈。就像国际新媒体艺术之父罗伊·阿斯科特所言：个人表达与个人创意已经由艺术家延伸到了观众，人们对艺术家的要求不再是创作动人的内容，而是涉及环境、空间，让观众能够参与其中。艺术家现在所做的不再是在现实世界中取以反映他的个人观点，而是构造框架，任由观念在其中创造自己的世界。

在参与、沉浸、融合、共生的时代主题词下，如何悦纳技术的蝶变成为摆在艺术面前的新课题。作者和观者的身份不断模糊，探索也将持续进行。

徐寿：传统中国最后的“大工匠”

科林碎玉

胡一峰



“工匠精神”这个词最近大热。历史上有不少名副其实的“大工匠”，比如被尊为木匠祖师爷的鲁班，又如平民哲学家墨子。近代前期，列强环伺，风雨飘摇，“工匠精神”的文脉传统却未中断。江苏无锡人徐寿，或许称得上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位“大工匠”。据说同治皇帝曾赐他“天下第一巧匠”的称号。现在人们谈“工匠精神”，大多强调精益求精、精益求精。这当然没错，不过，从徐寿的人生中还可以得到一些新

的认识。

徐寿，字雪村，出生于 1818 年，去世于 1884 年，和马克思同一年生，晚马克思一年去世。在技术方面已“无出其右者”，“然其心犹未足，以为见闻尚浅，故屡至上海搜求西国新理新法”。在他看来，翻译西方科技书籍，是引进西方科学的最佳途径。于是，1868 年，51 岁的徐寿在上海制造局翻译馆开始了译书的工作，这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据统计，徐寿父子、祖孙五人，一共翻译、撰述著作、专论 96 部，约 740 多万字，内容极为广泛，涉及化学、数学、工艺、农业、政治、经济、军事等，可谓近代第一的“翻译家族”。

英国人傅兰雅是近代最负盛名的“洋教习”之一，也是与徐寿一起创办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合作译书达 17 年之久的好基友。他向来认为，“考中国古今来之人性，与格致不悖”，徐寿却是一个例外，“惟徐雪村一人，自开馆以来，尚未辞职，今虽年高，然而考究格致之心，尚未减少。”此外，徐寿的这段话也启人思考：“化学各事，初视似无兴趣，然久之，实属开心益智，且与民生实用大有益”。用今天的话说，徐寿要追求的是有温度的科技，他给自己定的目标应该是一个“目中有人”的技术专家吧。

按说这已经很高明了，但徐寿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止步于能工巧匠，而是对科技之理孜孜以求。1867 年，已知天命的徐寿，在技术方面已“无出其右者”，“然其心犹未足，以为见闻尚浅，故屡至上海搜求西国新理新法”。在他看来，翻译西方科技书籍，是引进西方科学的最佳途径。于是，1868 年，51 岁的徐寿在上海制造局翻译馆开始了译书的工作，这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据统计，徐寿父子、祖孙五人，一共翻译、撰述著作、专论 96 部，约 740 多万字，内容极为广泛，涉及化学、数学、工艺、农业、政治、经济、军事等，可谓近代第一的“翻译家族”。

英国人傅兰雅是近代最负盛名的“洋教习”之一，也是与徐寿一起创办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合作译书达 17 年之久的好基友。他向来认为，“考中国古今来之人性，与格致不悖”，徐寿却是一个例外，“惟徐雪村一人，自开馆以来，尚未辞职，今虽年高，然而考究格致之心，尚未减少。”此外，徐寿的这段话也启人思考：“化学各事，初视似无兴趣，然久之，实属开心益智，且与民生实用大有益”。用今天的话说，徐寿要追求的是有温度的科技，他给自己定的目标应该是一个“目中有人”的技术专家吧。

俗话说，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在晚清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格局中，成功的科技专家背后往往站着有担当的政治家。站在徐寿身后的，便是大

清帝国的顶梁柱曾国藩，他对博学多才之士，“尤加敬礼，乐于交游”，尤其重视网罗近代科技人才，按曾国藩的说法，“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乎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1861 年，也就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第二年，徐寿以“精研器数、博涉多通”，进入曾国藩幕府，先后在安庆、江宁制造局供事，期间，完成了“黄鹂号”制造等大事，试制过程中，曾国藩明确表示，“如有一次或二次之失败，此项工程仍须进行”。再后来，徐寿专心翻译事业，也与曾国藩“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本”的思想密切相关。

徐寿的 60 多年人生，历经大清帝国嘉庆、咸丰、道光、同治、光绪五位皇帝，这是一个老大帝国已遭西方势力沉重打击，但自信尚未被完全打垮的时期，也是传统知识分子向第一代新知识分子转型的时期。徐寿是中国传统工匠的谢幕人，也是近代科技知识分子的开路者。后人对他有如下评价：“卓越徐君，事实求是，服膺西学，深会其旨。辨别性质，研精覃思，技也进道，格物致知”。今天，我们在震撼于这位“大工匠”徐寿的辉煌成就之余，或许更应该看到的是，“工匠精神”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雕琢，至少还应包括对技术之“理”和“道”的追寻，以及技术造福于民的信念。最后，其实也是最重要的，还需要一批有容错精神、伯乐眼光，又敢于担当的政治家，为“工匠精神”之勃兴与传承保驾护航。

“两弹一艇”那些事

邱晓杰



对伟大的音乐家王洛宾来说，这里是催生浪漫情愫的地方，一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感动了无数人；在宣讲报告会讲解员的讲述中，这里成就了最遥远的距离、最奢侈的爱情——一对新婚夫妇分别被分配到了同一个地方，却因为保密协议，不能告诉对方自己究竟在哪里、在干什么。即便是寄信，信件上也没有寄出地址，信件会从寄出地绕北京一圈，然后再寄回去。直到庆功宴上，这对夫妇才发现，原来两个人工作的车间，相距只在咫尺。

金银滩，这个听起来比花还美的地方，和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也只能“隐姓埋名”，以“221 基地”作为对外的代号。海拔 3200 米的青海高原，地势高，气压低，高寒缺氧，空气稀薄，水烧不到沸点，饭煮不到熟透，而且气候多变，风雪冰雹说来就来，一年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

就在这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一群有共同理想的人聚集到一起，他们之中，有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专家、技艺高超的技术工人、默默奉献的管理干部……在经济落后、工业很不发达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先后实现了原子弹、氢弹和核潜艇的突破，又在核能的和平利用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金银滩上发生的故事，只是历史的缩影。由于事业的特殊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神秘的核工业人一直隐藏在历史的幕后。

李鹰翔的《“两弹一艇”那些事》讲述了更多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作者亲历并见证了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过程中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远到上世纪 50 年代，刘杰带着铀矿石到南海汇报，展示我国拥有发展核武器所必需的铀资源；近至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开工……他个人对这段“激情燃烧的光荣岁月”进行了真实、系统的回顾，既有“两弹一艇”研发历程中早期接受苏联援助的忠实记录，又有国人在外援断绝的条件下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讲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段特殊年代的特殊历史、特殊人物、特殊经历，堪称中国核工业早期建设发展的一部浓缩信史。

与时下社会上流行的不少讲史类著作“戏说”的风格不同，《“两弹一艇”那些事》保持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平易质朴的文风。书中涉及的人与事无不有出处，无不经严谨考证，力图还原当年的历史真相。

捧读《“两弹一艇”那些事》，令人对于那段虽然尘封已久却持续影响着当下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尽管今日的中国核工业历经多年结构调整、改革发展，无论是体制、经营方式还是发展领域，都与以往大不相同，但依然可以从当年艰苦卓绝的创业经历中汲取相当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核工业创业者留下了无数有形无形的财富和光荣传统，令后来者仰慕、学习和继承发扬。